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李林荣 著

JIANGYU
YU
WEIDU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跨世纪转型
疆域与维度

疆域与维度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跨世纪转型

李林荣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疆域与维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跨世纪转型/李林荣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039-4638-7

I. ①疆… II. ①李…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4030 号

疆域与维度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跨世纪转型

著 者 李林荣
责任编辑 陶 玮
封面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638-7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前言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正处于新一轮的深广变革之中。与发生在1980年代中期的上一轮类似规模的变革不同，当前这轮变革，从最初的出发点，到随后逐渐展现出来的总体走向，都并不再以观念、方法的推陈出新作为重心和主轴。取而代之的，是着力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术范畴本身的重新发掘、重新构造和重新认识。借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这或可称作从被“工具理性”支配的层次升华到了被“价值理性”支配的层次。

但之所以能够如此，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两轮变革实质上仍接续在同一条历史逻辑的脉络上，具有同样的起因、目标和意义。二十四五年前那场今天看来已平淡无奇的“观念热”和“方法热”，骤起骤落之间，以一番浮皮潦草的扫掠，竟引发当时整个文学事业急速社会化、思想化和现实化的宏阔变革潮流。其关键主要不在“观念热”、“方法热”本身，而在促成这种“观念热”和“方法热”的特殊社会文化语境。那是一个表现着突出的“后文革”症候的社会语境。置身其中的文学，从总体上很荣幸、也很自然地得到了一种如同希腊神话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那样悲壮、正义的形象投射：它备享精神尊严，却又饱经磨难，像一位无私济世而又光荣受难的圣者似的，期待着世俗的理解和救援。

“观念热”、“方法热”的兴起，带来了在一切关乎文学的思想领域冲决网罗的契机，也带来了给文学本体彻底松绑的可能。时代进程的一步顿挫，在使这样的契机和可能转瞬飘逝之余，也留下了反思和质疑为文学本体松绑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的空间。进入1990年代,“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①蔚成时尚,文学变革的路向顺势而变,自本体的解放转换为本体的扩张。

一时间,连横合纵、深挖广积之风,盛行文学研究界。宏观则打通现当代、囊括海内外、勾连上下古今、遍涉亚欧美澳非,大力营构世界华文文学的全息图景;微观则索隐探幽、烛照边缘、勘查角落,打捞佚名佚文,着意发掘那些被湮没或遭遗漏的文学历史的新地层。与此同时,当代大众文化和传媒研究等无法为传统的文学研究体系所归并的跨界或超界学术活动,也开始全面介入文学天地。一个与精英文学和纸介质文学既分庭抗礼又并驾齐驱,既有同一性又有互补性,在占取时空体量方面却明显更有优势的大众文学和非纸介质文学的浩荡流脉,因之而赫然现形。

很显然,由此展开的,是一个文学的外在疆域和内在维度同步巨变的崭新过程。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为文学本体争取更多自由的老问题,将在长久的搁置当中被逐步消解殆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甚至连中国现当代文学或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近代文学之类过于刻板机械的文学史断代概念,都将难免在现实与历史高度聚合趋势的反衬下,渐渐显得不敷使用。

新世纪的十年,把传媒和依附其上的社会大众施加给文学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又从1990年代的强度上提升了一层。基于互联网的新传媒造就了前所未有的E化文学和E化文学人口,同时也进一步变乱了文学生活的主体,使它分裂得更零散、更带有社会原子化倾向。毫无疑问,传媒技术和传媒体制的迅猛发展,为文学提供了同时逼近兴亡存废双重边际的方便或者风险。一个时空缩聚而人群分众的社会,不需要惺惺作态、反其道而行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文学实践,这样的文学实践出现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本身就有不道德的嫌疑。相形之下,利用新传媒的分众优势,具体、清晰、细致地展示和确证社会个体的差异,为更高层面的个体间斡旋和交互主体性建构准备条件,或许可算是在当前更适时、更合理的一种权宜的文学实践模式。

以上所述,粗略地勾勒了本书各篇章共同依托的问题意识背景。

依照早已成为专业入门常识的文学系统观,凡以一时一地的文学总体态势为核心论题的著述,至少应对文学整体系统中的创作/生产、传播/流通和接受

^① 此语最初出自李泽厚在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6月号(总第23期)“三边互动”栏目中的短评。该短评后收录于李泽厚《杂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7月版,第330页。

消费这三个最基本的环节，给予相对均衡、完整的点面兼顾的观照，否则就有以偏概全之失。相应地，在有关具体创作的讨论中，也应避免有意无意的体裁歧视或体裁缺席。

以此为准，本书部分篇章，特以文学的传播、接受和非小说体裁作品的分析为题。虽则如此，内容的覆盖面上自然仍是捉襟见肘、挂一漏万。在这方面，系统详尽的完善尚待将来；现在，只能敬祈读者多予谅解、指教。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篇 跨世纪转型中的文学格局	1
一 作为遗产和资源的“新时期文学”	3
二 新世纪文学的三重门	16
三 新世纪文学现在进行时态	29
第二篇 跨世纪转型中的小说潮流	39
一 突围与迷失：重审“文化寻根”	41
二 作为批评的“新写实”	56
三 非个人化境遇中的个人化叙事	62
四 “底层叙事”中的声音与沉默	67
第三篇 跨世纪转型中的诗潮与散文潮流	73
一 苍老的青春独白 ——诗潮新变三十年	75
二 世代层垒与潮流分际 ——1990年代散文创作与理论批评态势的转折	84
三 “丰富”何以成为我们的“痛苦” ——新世纪散文创作与理论批评态势分析	95
四 博客世界的表里冲突	103

第四篇	跨世纪转型中的文学疆域	107
一	碎裂的拼图	
	——作为学术话语范畴的台湾文学	109
二	跨海偕行三十年	
	——两岸当代文学互动进程的后顾与前瞻	113
三	内在的“他者”	
	——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台湾文学	118
四	认同困境与“他者”化迷思	
	——当前台湾文学在大陆传播及接受效应探微	129
第五篇	跨世纪转型中的创作个案	135
一	乡愁意识中的自我镜像	
	——重读鲁迅的《一件小事》与《故乡》	137
二	四两如何拨千斤	
	——重读老舍小说《断魂枪》	145
三	“伪神话”结构及其意义	
	——重读“十七年”的几部长篇小说	158
四	世俗的死灭与神性的彰显	
	——重读陈映真小说《加略人犹大的故事》	165
五	“后知青”和“后寻根”转向	
	——《马桥词典》《务虚笔记》的文学史意义	178
六	用生命抵押幸福的寓言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文体和主题	183
七	“顽主”的另一面是“顽童”	
	——《看上去很美》与王朔小说的移形换位	188
八	重塑的“乡村”与“家国”	
	——以乔忠延和王鼎钧的散文新作为例	197
九	逃逸：牢狱中的幻想	
	——先锋话剧《思凡》意蕴分析	205

第六篇 跨世纪转型中的文学评论·····	213
一 文学批评的伦理与视野·····	215
二 文学评论的惶惑与担当·····	221
三 重建文学评论的公信力·····	227
附 篇 跨世纪转型中的文坛与学界·····	231
一 现象与话题·····	233
二 书评与述评·····	250
三 偏向或迷误·····	267
参考文献要目·····	285
后 记·····	289

第一篇

跨世纪转型中的文学格局

一 作为遗产和资源的“新时期文学”

2008年，是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借此契机，政、经、文、史、哲等各学术领域，都兴起了一轮兼具纪念和盘点性质的回望“三十年”的话语热潮。其中最引人瞩目的热门议题，自然还是聚集在那些与整个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直接相关的政治学、经济学等宏大叙事性质的学术部门当中。

而位处社会文化边缘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的圈子里，事实上也早已闻风而动，应时起舞，自觉不自觉地大家环绕在重访和重估“新时期文学”的课题周围，展开了众声喧哗的言论擂台赛和话语嘉年华。

的确，“新时期文学”称得上是当代文学迄今为止的流程中最具历史转折意味和最能标志“改革开放”时代起步的一个特殊阶段。因而，从贯穿文学的创作实践、理论实践以及相关的观念和制度背景诸层次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步骤次第施行、连锁见效的角度上，对“新时期文学”做一番以线串珠式的全面梳理和一揽子摆平的总体评价，并非没有意义。

不过，由此所得的，只是一种单纯的、仪式性的纪念意义。它止于陈述表象和缅怀旧事的限度，不足与最大间隔已达“三十年”的观察、认知距离相匹配，也不能达到反思历史的高度，更不能从根本上涵盖“新时期文学”实际存在的全部意义。

那么，在作为一个纪念仪式的僵硬对象的意义和价值之外，“新时期文学”在今天，究竟对于我们还有哪些更重要和更现实的意义及价值？对此，或许至少可以从两个方向上来加以探索：一是“新时期文学”在终结或者休止一个旧的文学时代的维度上，能否构成一份历史内涵充足的精神遗产；二是“新时期文学”在支撑和推进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维度上，能否体现出相对长

疆域与维度

远的某种镜鉴性或资源性的思想价值。

（一）“新时期文学”作为精神遗产的多重面相

时下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热烈谈论中，一个聚讼纷纭的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新时期”的起止年限。热衷这一问题的论者，多属于在“修史”方面别有抱负之士。因为在现存的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教材和所有高校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讲义中，“新时期文学”的时间上下限，其实早成为一个具体标度或有所异而本质上不存任何分歧的模糊型共识。现在就此另做专门的推究、辩难，若非简单地出于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之意，则必有对既有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认识进行重审和改写的严肃企图。

这里涉及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一切文学史断代概念的外延界定，都具有并非先决于其内涵的某种历史发生断裂的经验基础。具体地讲，一个文学史断代概念的时间上限，总是以从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格局中被动逃逸或者主动出走的经验为基础的；而它的时间下限，则刚好相反地对应着在一个高度活跃的动态历史格局中遭受挤压、吞噬和终至消解的经验。“新时期文学”也不例外，——虽然它在我们含混成习的文学史话语和文学史意识中，似乎已经流转、磨蚀得带上了空气般的透明度。

以它的上限来看，无论是从1976年清明时节爆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或1978年秋冬之际面世的话剧《于无声处》算起，还是从1977年11月北京发表刘心武小说《班主任》和次年8月上海发表卢新华小说《伤痕》为“伤痕文学”的潮流开闸放水算起，实际都是以“政治先行，文艺后变”^①的模式，把“新时期文学”的发端，界定成了促使“文化大革命”骤趋消停的那场政治形势突变的一缕侧影和余音。

归结到底，这几个看起来并不一致的“新时期文学”的起点，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时间点——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那个“胜利的十月”——投射出来的镜像。

^① 此处引语借用自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页。

毫无疑问,“美酒飘香歌声飞”、“八亿神州举金杯”^①的1976年10月,是一个真正富于戏剧性的历史转折点。它在历史现场造成的开云见日式的即时效应,甚至赢得了来自政治和文化双重层面的超限修辞:“第二次解放”。然而,随后两年的事态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表明,1976年10月政治高层当机立断的英明果敢之举,仍然是萌生和展现在“前新时期”社会情境的内部,并且是借助于维系这一社会情境的特殊文化逻辑和政治伦理,才得以既迅速又稳妥地克尽其功的。

到1978年12月下旬发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布“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②为止,“十月响春雷”之后的政治和文艺领域里,都同样一直是暖风劲吹,处处回旋着全民大合奏的三重主旋律:揭批控诉的咏叹调、化悲愤为力量的交响乐和高歌猛进的进军曲。

恰是在这颇具传奇和喜剧意味的特定社会氛围中,原本并没有任何内涵深度的寻常名词“新时期”,偶然地升格到了意识形态的层次,并从一个主要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表征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修辞用语,逐步换位移形,终于转变成后来在当代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广为运用的一个历史断代概念。

在这一过程中,最初赋予“新时期”庄重含义的正式文本,是1977年8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按照报告中唯一一次对“新时期”所做的正面表述——“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③“新时期”这个说法的启用,根本上是为了给文化大革命画上一道休止符。

紧贴在这道最早亮出的“文革”休止符上的“胜利结束”的喜庆色彩,在此后几年陆续出台的许多政治文件中得到了有力的剥离,并最终在1981年6月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反过来代之以全面

① 这两处引语都出自1977年初开始在全国广为流行的《祝酒歌》(施光南作曲,韩伟作词,李光羲演唱版)的歌词。

② 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371/4441902.html>。

③ 引自华国锋:《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449/4526442.html>。

否定的痛切与凝重。这也就说明：政治意义上的“新时期”，在其兴起的最初四年里，呈现了一正一反前后两个阶段、两种性质的状态。相比之下，前一个阶段和前一种性质的“新时期”，形式感和仪式性更强，而后一个阶段、后一种性质的“新时期”，则凸显出更彻底、更充分的终结和超越一个旧时代的新实质和新机制。

与此关联，文学界对于作为词语的“新时期”的引进和转喻，以及对于作为这一词语所对应的社会、政治双重意义上的“新时期”现实的感触和反应，也经历了由简入繁、由表及里和由单向变为多向的杂化过程。可是，文学方面的这种“新时期”语义和语境的双重嬗变，在细节上远不如从政治方面对“新时期”所做的这台牵筋动骨的语用学手术那么精准、深切和干脆利落。

也许，这仅仅是文学作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①，所具有的那种不容易及时、确切地对历史共同体的前后左右各侧面作出分辨和扬弃的一般属性的必然体现，而不该归咎为具体某时某地的某些文学从业者才拙力乏、境界狭隘。

但即便换一个较低的尺度，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文学意义上的“新时期”迟至1980年代中期，总体上还是都保持着和“前新时期”形散神聚、缠夹不清的暧昧状况。或者换句话说，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七八年里，文学上的“新时期”和政治上的“新时期”存在着内在的流变节奏及其精神实质的错位关系。

当政治上的“新时期”已经摆脱徒具其表的仪式禁忌，开始明确放弃“动员”加“运动”的发展机制时，文学上的“新时期”却正鼓荡在从“伤痕”到“反思”，从“反思”再到“改革”，接着又从“改革”到“寻根”的波浪相逐式的宏阔潮流之中。

单独就引领和追随这些潮流的作家作品个案而言，自发、自主、自由的特征仿佛并不鲜见。但就全局性的文学气候和它背后的文学秩序而论，这些潮流发动、扩展和推进的各环节，事实上都依旧整合在自上而下的“总动员”和无人可以逍遥自外的“大运动”的樊篱之内。和这几波主要与小说有关的潮

^① 引语出自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于伦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703页。

流同步出现的诗歌方面的“朦胧三崛起”^①、剧作和电影方面的《苦恋》及《太阳与人》、^②文艺理论方面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③等所引发的争议事件，更以多少挟带些肃杀之气的方式，印证了文学“新时期”朝向宽松、和谐与自由的进程，不仅是跟与它相左的另一个进程并行的，而且更是以被后者完全裹胁的形态显现出来的。

“新时期”在文学维度上的第一次深刻转型，发生在1980年代中期的“方法年”和“观念年”。^④尽管这是两个如今已被一部分曾身临其境、亲历其事的人士看淡和看衰了的年头，但方法和观念变革的成败得失，本来也没有任何可以立竿见影、即时见效的检验尺度。若非要依当时的情形来判断这种变革的力度和强度是否到位，那么最关键的观察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它是否带来了一片也许是模糊的，但毕竟是全新的价值选择的视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1985年前后“方法”和“观念”的新潮遍地纵横，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各领风骚三五月的那两年多，是当代文学的“新时期”之中与近现代之交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最堪比拟的一个时段。

之所以这样说，重要的原因并不在于两者场面上有多么相似，而是在于它们如出一辙似的把机遇和挑战、觉醒和迷茫、希望和绝望熔铸一体，陡然抛出来赠予世人的那种时代已滑行至某个临界点的特殊精神氛围。换一个角度的观察不难发现，“方法论热”的急遽升温，有文学界内部的前因和远因，但直接的助燃点是伴随国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而来的城市文化不可避免的对外开

① 即为“朦胧诗”进行理论辩护的三篇标题中带有“崛起”一词的文章：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初刊于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初刊于《诗刊》1981年第3期）以及徐振亚《崛起的诗群》（初刊于《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② 剧本《苦恋》初刊于《十月》1979年第3期，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后期送审期间改名为《太阳和人》（长春电影制片厂1980年出品，导演彭宁）。剧本作者和电影编剧均为白桦。

③ 以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1983年3月7日在中央党校做报告，3月16日刊于《人民日报》）和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1984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做报告，1月27日刊于《人民日报》）间的对立为主要标志。

④ 将1984或1985年定名为“方法年”，目前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一般已不存异议。而随“方法年”后，是否存在一个如愿所期、见诸实效且贯彻全年的“观念年”，则在不同的亲历者和研究者中，尚存程度不同的现场观感和历史评价差异。本文对此取肯定态度，理由是“观念年”核心在于“观念热”，积极促其变是聚焦于“观念”的一种“热”，积极防其变也是聚焦于“观念”的一种“热”。

放和对外交流^①。

短时间内自海外特别是西方各国以泄洪之势汹涌而入的大量并不一定是最新的，但一定是陌生的“新”思潮，给不止于文学研究一隅的整个“后文革”中国的学术界提供了“恶补”精神营养和追讨历史欠账的机缘，同时也制造了自知已被发达国家远甩在后和将在国际竞争中被抛离出局的一种紧迫得叫人艰于喘息的危机感、忧患感和惊悸感。

包括创作实践中有相当程度的崭新表现和独到追求的后期“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先锋派小说”、“后朦胧诗”以及“探索戏剧”在内，1980年代中期以降文学上所有非理论形式的努力，都不但没能取得起初预期之中的那种在文坛上一锤定音式的全局性成功，反而始料未及地形成了一种在各自为战、四面出击、活力四射的态势中丧失了大家共同的方向和目标的乱象。由于众所周知的一些偶发因素的刺激，这个内部充斥着东奔西突、左推右挡、上拉下拽的复杂张力的文学格局，最终是陷落在198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秩序的整体扭转之中，而仓猝走向了瓦解。

这种结果，至今仍使许多人相信，在1980年代中期经“方法论热”和“观念热”两度烘焙而成型的那个较之此前七八年间的“新时期文学”面目更加新颖了一层的新“新时期文学”，其本身的构成从一开始就是有严重的内在缺陷的，否则它就不应该有后来那样致命的下场。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1980年代中期的“方法年”和“观念年”，与显而易见可以作为一道历史分水岭的1980年代的最后一年同样，都被认为是能够给“新时期文学”打出一个醒目的分号，或者断然画下句号的年份。这一点，想必今天纯为应景而就着笼统包装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这类题目大作特作各样半宣传、半纪念性质的宏文说论的人，也是心知肚明的。

（二）“新时期文学”作为思想资源的价值吊诡

“新时期文学”作为思想资源的意义，是在它作为历史的一个段落完全落

^① 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以城市为重点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紧随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开放而来的，是同样以城市为中心场域的文化思潮的开放变革大潮。